



牛犇:命有多长,我就演多长

2026年5月3日,电话接通,话筒那端声音洪亮,中气十足,哪听得出这是一位92岁的老人。牛老在电话那头说:“前一阵去北京好几次,都是去录节目,录完就回来了。今天在家不出去。”

下午2点,如约来到他居住的老年公寓。又见牛犇——一位住在老年公寓却自己做饭洗衣、不要护工、把剩菜罩子都做得有模有样的老人,一位92岁还到处飞的老人。

“菜只要不变质,我就照吃”——老年公寓里的烟火日常

牛犇的一天,从自己动手开始。早上起来,自己做早饭。粥也好,面也好,简单对付一口,然后该干嘛干嘛。中午自己下厨,炒两个菜,吃不完的剩菜用自制的菜罩盖上。那菜罩是他用桶装水瓶剪的,简单实用。他得意地展示这个小发明:“你看,这样苍蝇进不去,也不闷气。”

住在老年公寓,屋里的物件不多,但每一件都收拾得得利索。他不用护工。92岁的人,自己洗衣服,一周一次。洗衣机轰隆隆转的时候,他就坐在起居室内看剧本或者回消息。洗完的衣服自己晾。不到五平方米的阳台上,两根晾衣杆横在头顶,衣裤挂成一排,有衬衫,有背心,有长裤,有毛巾,在五月的阳光里轻轻晃荡。

阳台不光是晾衣服的地方。地上摆着几个小花盆,种着小花小草,不是什么名贵品种,就是好养活的那些,绿油油的,有几朵开了花。一个小鱼缸里养着小动物,大概是小金鱼或者小龟之类。他每天浇花、喂食,蹲在那儿看一会儿,算是休闲。“麻雀虽小,五脏俱全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,语气里没有半点凑合的意思,倒像是在介绍一座自己精心打理的庄园。

公寓里的工作人员都知道牛犇老师脾气好,从来不提什么特殊要求,但也都知道他什么都喜欢自己干。有人想帮他洗衣服,他摆摆手:“不用不用,我自己来,活动活动。”有人想帮他做饭,他谢绝:“你们做的我不一定吃得惯,我自己知道自己的口味。”

生活方面,他有自己的讲究。不是讲究精细,是讲究不浪费。“菜只要不变质,我就照吃。”这话他说得理直气壮,带着一种经历过饥馑年代的人才有的笃定。他不觉得这有什么寒酸,反而觉得这是本分。1943年父母在同一天离世,9岁的他跟大哥大嫂小妹到北平投奔亲戚,大嫂生孩子,他当“月嫂”,煮稀饭洗尿布,奖励是半个白煮鸡蛋。从半个鸡蛋到如今,他什么苦没吃过?食物就是食物,能吃饱就行,没那么多讲究。

但平时穿什么、正式场合穿什么,他分得清清楚楚。卧室兼衣帽间里,衣服分类挂着,整整齐齐。出席活动要穿正装,他提前一天就挂出来,自己检查一遍扣子,拉链有没有问题。不用别人操心,一辈子都这么过来的。

有人问他,这么大年纪了干嘛不找个护工,或者跟子女住?他摇摇头,说这样自在。孩子们有孩子们的事,他不想麻烦任何人。自己能动的,就自己动。动不了再说。

就是这样一位把自己打理得清清爽爽的老人,手机一响,谈的都是工作。“上个礼拜去北京。”“那个节目组说好了时间。”“剧本我看看。”——在他的字典里,没有“退休”两个字。

“四头牛,跑起来比谁都快”——那些刻进生命里的人

牛犇的情感世界里,装着一长串名字,背后都是一段段几十年的交情。

他原名张学景,1934年9月生于天津,兄妹七个排行第六。1945年,大哥考取了驾照,被分配在华北电影公司。大哥住的院子里都是电影厂的员工,他们都知道,张学景是汽车驾驶员的弟弟。长着一张娃娃脸的他活泼机灵,邻居有需要他就挺身而出,常常给天津籍老乡、导演谢添的自行车打足气。邻居们说他很有“眼力

见”——有些事,别人还在想,他已经做了。

谢添看中了这个孩子。1945年,他推荐11岁的张学景出演《圣城记》里农村孩子“小牛子”。“他们让我站在那里,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。叫我笑,我就笑;要我说话,我就说话,我都能应对自如。”“小牛子”从此成了他的代名词。

1948年,演员白杨通过谢添找到他,邀他出演电影《火葬》里的小丈夫孟长春。赴港前夕,谢添说:“小牛子,你再加三个牛,就叫‘牛犇’吧。四头牛,跑起来比谁都快!”艺名由此诞生。1952年,牛犇回到上海,谢添又请他本色出演《龙须沟》里的二嘎子。谢添是他的“开门”老师,电影事业的引路人。2003年12月13日,得知谢添去世,牛犇的血压一下飙到了190。

1980年10月,赵丹病重,想见牛犇最后一面。他正在拍《天云山传奇》的关键戏份,请假未获批准。10日,赵丹去世。这成了他一生的遗憾。赵丹生前对他说过:“演戏要生活、自然,要有立体感,要演出一个活生生的人。”这句话教他演戏,也教他做人,牛犇同样记了一辈子。

王铁成演周总理之后,牛犇佩服得五体投地。2023年10月,牛犇口述自传《演一辈子小人物》出版,他委托出版社送了一本给王铁成。彼时王铁成眼睛已看不见,是夫人念给他听的。听完后王铁成说:“没想到牛犇那么大岁数了,记忆力还那么好。”2024年6月21日晚,牛犇辗转难眠。次日清晨6点多,儿子王侃来电:王铁成已于昨晚去世。他的血压再次飙升。

作曲家黄准,更是让他放不下的人。

黄准是电影《红色娘子军》主题曲《娘子军连歌》的作曲,也是牛犇好几部戏的老书记。“向前走,向前走,战士的责任重,妇女的冤仇深……”这首歌曲犹在耳,鼓舞着他。

前些年,黄准快100岁了,住进华东医院。牛犇从外地回来,第一件事就是拿着花,从浦东周浦的老年公寓打车,斥“巨资”60多元去探望。到医院一看,黄准身上插着管子,戴着氧气罩,病容憔悴。

他走过去,帮她取下氧气罩,说:“你要给我留一个最好的形象,笑一个。”

那一刻,黄准笑了。笑颜如花。那一刻,病房里没有垂暮病人的阴霾,只剩下老朋友之间最后的温柔相对。牛犇拍下了这张照片。他说:“这是我和她之间的老友情深,那个瞬间,我永远也不会忘记!”“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她去世时,他们没告诉我。”

老友们一个一个走了,剩下他一个人,还在演,还在走红毯,还在接受采访。

人活一生,重在一个“情”字。

2026年4月16日,第十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式上,88岁的祝希娟,《红色娘子军》里吴琼花的扮演者,看见人群中的牛犇,她大声喊出片中红军通信员角色名:“小虎,你好!”牛犇挥手回应:“琼花,你好!”时隔六十多年,那是属于他和她,属于那一代电影人的默契。那一刻,黄准的旋律仿佛也在空气中回荡:“向前走,向前走,战士的责任重……”

“问心无愧,配角也有价值”——翻过一页,继续向前

从1945年跨入影坛,牛犇塑造了近200个人物。演过农民,演过工人,演过战士,演过骑兵。演过有名有姓的角色,也演过只有一两个镜头的无名小角色。

“没有小角色,只有小演员。”赵丹告诉他,角色没有大小之分,只有能与无能之别。每一个在银幕上出现的人物,哪怕只有一个镜头,都必须认真对待。“《延安文艺座谈会》的主要精神,就是提倡文艺工作者要为工农兵服务。首先我们要把自己的脚,自己的屁股移到工农兵这边来。我做到了,到现在问心无愧。”

他演农民,拍戏之前,提前到农村,跟农民一起下地干活,学他们怎么拿锄头,怎么走路,怎么蹲在田埂上抽烟袋。手磨起泡,脸晒



脱皮,他才觉得入了门。

他演工人,不管拿起哪样工具都应对自如。钳子、扳手、焊枪,拿到手上就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师傅,动作行云流水。

他演骑兵,上马、策马、勒马,一气呵成。导演谢晋当年看了,脱口而出:“牛犇是电影厂第一个表演骑兵不需要替身的。”这夸赞他演到现在,不是拿来炫耀,是拿来证明——证明一个演员下了功夫,角色就会给他回报。

“没有人说我演得不像。因为我首先要学。不仅学他们的动作,更要学他们的精神,这是自觉的行动。”

他说,安保、旅馆清洁工、路人,远远看到他都会上前打招呼。“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自己很接地气。观众认可我,对我那么亲切,这就是我作为配角的价值。”

2017年,他获得第3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。他走上领奖台,万众瞩目。同年,入选“100名为中国电影作出杰出贡献的电影工作者”。2024年,他获评“感动中国2023年度人物”。

面对一尊奖杯,他说:“这个奖不是说明我过去做了什么,而是今后我还要做些什么。每个奖杯,都意味着已经翻过去一页。”

于是人们看到,92岁的牛犇,比很多年轻人还忙。2026年年初到现在,仅仅北京一地,他就跑了四次。

2月14日,“经典之夜”盛典,致敬中国电影120周年。他站在舞台中央,聚光灯下,身形瘦小却站得笔直:“我现在还在拍戏,我愿意为我们的电影事业作贡献。”不是客套话。下台后有年轻记者问他最近在拍什么,他当真掰着指数起来,数完说:“有的还没定,定了告诉你。”

3月20日,首届CMG中国电影盛典。他穿着一身深红色正装走上红毯,步伐不快,但很稳。轮到他演讲,主题是《一二·九》,没有提词器,没有手卡,他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头,开口第一句就抓住了全场——

“电影这条路,从来不是一个人跑得快,而是一群电影人走得远。电影是我的伴,命有多长我就演多长。”

那一刻,他眼中有光。不是泪光,是生命的光。

有人问他为什么能保持这样的精力。他摇摇头:“能多活几年就要多做几年事,不进则退。”自传出版后,许多人请他签名,他每本都一一签好。有人建议他用印章代替,省力气。他认真地说:“那怎么行,亲笔签才显出对别人的尊重。”

问他当下还有什么遗憾。他想了想:“很多想做的事还没做完。剧本还有没看完的,答应人家的客串还没去拍。只要活着,就要有事做。”“在我活着的这段时间里,我会努力跟上队伍,继续努力锤炼自己,把好的银幕形象留给后人。”

告别的时候,他送到门口,说:“有空来坐。”那个不大的房间里,阳光正从阳台照进来,晾着的衣服轻轻晃,小花小草安静地长着。

张志萍

范用,生于1923年,卒于2010年,江苏镇江人,出版家。曾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、副总编辑兼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。他策划出版的《傅雷家书》《随想录》《牛棚日记》《干校六记》等著作,都是畅销书,一时洛阳纸贵,人人以拥有一册为傲。他创办的《读书》《新华文摘》杂志,也是高格独标,风行一时。熟悉范用的人都知道,他是个“三多先生”,“书多,酒多,朋友多”。老记者高汾,也是他的一位老朋友,退休后,被上海新民晚报聘为驻京特约编辑。

1998年,她收到了范用的一封信。看了这封信,特别是附来的照片,就会发现,范用还是一个很有趣的人。

那张黑白照片,两面印刷,都是范用小时候和父亲一起拍的。一帧摄于1924年,一帧是九年后的1933年。1924年的那帧,一岁的范用被父亲抱在怀里,光着个小脑袋,稚气可掬,身穿一件斜襟的绣花小棉袄,开裆裤中间,露出一团尿布。无论他父亲,还是摄影师,似乎都没发现,或者发现了,并不在意。小主角变成小老头后,觉得应该批评一下父亲,太不注意保护儿子隐私了。也许他记得古话“子为父隐”,批评也不能儿子出面,这个光荣任务就交给了老朋友。



胡德夫:唱属于自己的歌

“不要问我从哪里来,我的故乡在远方。”一首《橄榄树》,几许离愁与苍凉,传唱大江南北。日前,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,古稀之年的胡德夫于话剧《江/云·之/间》将它深情道来。

被誉为“台湾民谣之父”的胡德夫已白发皆白,不笑时嘴角会抿出一抹相当倔强的弧线。他跋涉过漫长旅途,依旧唱着属于自己的歌。

跨界话剧 有默契也有乡愁

说起跨界话剧《江/云·之/间》的演出经历,胡德夫把它比作老友之间的一种默契。1986年,赖声川导演、编剧的经典话剧《暗恋桃花源》首演,剧中,江滨柳与云之凡在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告别,此后战火纷飞,一句“等你来回来”成了漫长岁月里无法寄出的回音。《暗恋桃花源》首演35年后,赖声川终于执笔填补了那段叙事留白——他的第40部作品《江/云·之/间》,江滨柳、云之凡那些彼此收到或收不到的书信,交织成一部关于错过也关于重逢的剧场诗篇。

《江/云·之/间》中,胡德夫独自在一束灯光下,游离又深情地弹唱,那些被时代鲜明烙印的歌曲串成一条听觉上的主线。“我和赖声川导演认识很多年。”胡德夫回忆,50多年前,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就曾在一起玩音乐。写出《江/云·之/间》后,赖声川和胡德夫对照时间线,筛选《橄榄树》《太平洋的风》《匆匆》等合适的旋律,填入故事脉络。

有观众说,整部《江/云·之/间》,没有具体角色的胡德夫是唯一一个“演自己”的人。胡德夫出生在台东,11岁前,他是长在大山里的孩子。第一次远行是离家求学,自那时起,绵长的“乡愁”便充盈在他的心头。

多年创作 坚持唱“自己的歌”

从古至今,咏叹乡愁的作品浩如烟海,而李泰祥作曲、三毛作词

的《橄榄树》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广为人知的歌曲之一。如果说齐豫的歌清澈空灵,那么胡德夫的演绎更多了一丝厚重沧桑。当年,李泰祥写歌,胡德夫是旁边那个削铅笔的人,“我看着他写下‘橄榄树’这三个字,字体细细长长的,像竹子一样。他思考这首歌要怎么发展时,我会说,你来哼哼看。”李泰祥也出生在台东,橄榄树虽然不是当地的树种,“但我们都记得,家里总能闻到一种槟榔树叶的清香,那种感觉是很相通的。”

对故土与家乡的眷恋,长久地萦绕在胡德夫的创作中,他唱《牛背上的小孩》《美丽的稻穗》

有趣的范用

信是这样写的——

高汾:

告诉您一个小秘密:

我的爸爸不懂事,我的尿布搭(牵)拉下来,不知道给我塞塞好,让我出洋相,垂诸万世。

您可写一短文,寻寻开心。

信是1998年12月25日寄出的。彼时,范用已是75岁老翁,然而顽童心趣不改。收信的高汾,比他还大三岁,那年已经78了。两位古稀望杖的老人,一位让另一位拿自己当靶子,让别人“寻寻开心”,是不是很好玩?

我估计,这是1999年新年到来之前,范用给高汾提供一点写文章的谈资。每年新年、春节,高汾这位老编辑,总会让朋友们给副刊写点什么。这回,范用偷懒,打算只负责喂料,不亲自操刀了。

不知道高汾当时写了什么没有,我倒觉得,这事值得写篇小文,但重点不是尿布。

人活在世上,除了吃喝拉撒睡,学习,工作外,还需要有点爱好,比如交友、看戏、旅游,甚至抽烟、喝酒、打牌、唱歌、跳舞、写字、画画、下棋、打球、游泳……还有一点,不可小觑,那就是会开玩笑,有幽默感,不能总板着脸,一脸门子官司。我说的那些爱好,一个人不可能都有,但至少有一两种,两三种,再加上一点点幽默感,就很好了。没有一点个人爱好,特别是不懂幽默,这个人一定是无趣的。

范用就是个有趣的人。

以下都是从他的贺年卡、贺年信中发掘出来的“硬通货”。

1994年,他搬了家,给老朋友寄贺年卡,空白处印了一个“迁帖”,开头一段是:来北京住东城一住四十五年,而今搬到城南,住进高楼,冒充“上层人士”。室高两米五;好在我俩都是小尺码,倒也相称。“上层人士”,“小尺码”,趣味全出。

1997年,他写了一篇文章,题目是《最初的梦》,发在《收获》第四期上。年底,他复制了一份小样,印成折页贺卡模样,上面加一句话:“高集高汾一笑,新春愉快。范用拜贺,丁丑岁杪”。

文章写小时候,镇江老宅对面一家小印刷铺子的事,写的全是小事,活灵活现,趣味盎然。一张白纸,从机器这头吃进去,那头吐出来,上面就印满了字;印刷机铺里整天“克朗朗朗”的声音,蛮好听;绿墨和黄墨用刮刀抹到圆盘上一调就变成草绿色,这些事,让他到了晚年还记忆犹新。他还把涂满颜色的纸贴在墙上,自己欣赏。他写道,说不定抽象艺术,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艺术

家,就是这么来的。范用晚年,早早给自己安排了后事。他写了一份通告,抬头是他任职的人民出版社,其中有两

条是这样的: 本人与家属对组织无任何要求,子女早已自立,老妻有退休金可领,不虞衣食,只请协助接洽火化,并取回骨灰交付家属收存。

我自拟讣闻,请用稍微好一点的纸张铅印一二百份,并请按我留下的名单寄发。务请不要印发任何行述。我是一名普通工作人员,一生所作所为不足道,何况还说过不少错话,办了不少蠢事。生于今世,很难有人能够逃脱这种历史的嘲弄,绝非一篇行述清算得了。读过讣非,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。

自印讣闻,一本正经地调侃那些其实并不太正经的事。仔细品,才能品出味道。

很有意思,范用这个年纪的老文化人,大多都是这样很有趣的人。比如他的老朋友黄苗子,整个一个笑眯眯的老顽童。他活了99岁,71岁就写了一个很长的遗嘱,诙谐,豁达,乐观,流传很广。其中关于骨灰处理最有创意:约几位亲友,由一位长者主持,肃立在抽水马桶旁边,默哀毕,就把骨灰倒进马桶,长者扳动水箱把手,礼毕而散。又如启功,苦于求书者络绎不绝,不得不在门口贴张纸条“熊猫病了”。曾有位军队高官派人登门要字,态度很坏,老人不高兴,问:不写枪毙吗?

有趣的老先生们陆续走了。但愿我们这一代,我们的下一代,也多一些有趣的人。

张宝林

《太平洋的风》《大武山美丽的妈妈》,在英文歌大行其道的年代,胡德夫坚持写源自这片土地的“自己的歌”。《江/云·之/间》关于生死的片段,他选择用当地亘古流传的歌曲搭配。几年前,胡德夫还尝试把元曲《天净沙·秋思》填进台湾古谣《来甦》。《天净沙·秋思》的结构、吐息竟与《来甦》意外地契合。“这都是我们国家的文化珍宝。”胡德夫感叹道,“太妙了。”

往来两岸 歌声早已连接在一起

这两年,跟随巡演步伐,胡德夫频繁奔走在大陆的各个城市之间,北京更是他最早到访的城市之一。他第一次踏上大陆的土地,是与一位教授同行。教授听说自己的表哥还在世,便到北京探望,下了飞机,他们直奔北京饭店,三个人互相拥抱,泪流不止。

那是一种巨大的、彻骨的思乡之痛。上世纪70年代,胡德夫曾演唱杨弦谱曲、取余光中的诗为词的《乡愁四韵》,“我才真正读懂余光中老师心中的那份乡愁,是几百万人的乡愁。”

因此,对于当下的两岸交流,胡德夫的珍惜溢于言表。“两岸的歌声很早就连接在一起,音乐的交流一直被同胞们寄予期待,这是真正发自大家内心的需要。”

没有演出邀约时,胡德夫便回到家乡,安静地守候每一天的日月升降,哪怕在很多人看来,这对一位仍要外出工作的老者而言不算便利。乡间的日常生活很琐碎,比如,胡德夫要抽出不少时间,照顾太太收养的流浪动物,认真地在它们淘气时劝架。“天气好坏都一样精彩。”胡德夫说,即便是乌云,“里面也有很多颜色。每天睁开眼睛,我们都会遇到奇迹。”

高倩